安徽博物院藏文徵明《木泾幽居图卷》赏析

王业柱

“吴门四家”中的文徵明(1470-1559)可谓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位妇孺皆知的艺术名家，他以卓越的才情在6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为后世留下了很多为人称道的艺术精品，安徽博物院馆藏一级文物《木泾幽居图卷》便是其中一件。

《木泾幽居图卷》，绢本设色，纵25.1厘米，横75.2厘米，图绘友人周复俊在木泾别业幽居图景，作品作于明嘉靖丁酉年(1537)，是年文徵明68岁，是其中晚年青绿山水代表作之一。卷后有文徵明自题一则，另有杨慎、邢侗、钱达道、罗文瑞、启功诸位名家题跋。该卷系孙大光、张刚夫妇1987年捐赠入藏，后经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定级为一级文物。

《木泾幽居图卷》是典型的文徵明青绿江南书斋山水，类似传世作品有《葵阳图》《浒溪草堂图》《真赏斋图》等。该卷以“一河两岸”构图，描绘木泾幽居图景，画面以一湾玉水中分，像主周复俊位于画面中下方，头束发冠、衣带飘举、倜傥风流，携抱琴童子，移步水榭，似与远处两位鼓枻而来的隐友赴一场琴会。左侧连廊屋舍，绿木葱茏，可遥见一位袍服妇人拱手静候，身旁有插架万轴，红袖添香也。画中人物视线皆指向水榭处，以即将到来的琴事为图卷叙事中心。整幅作品用笔工稳谨严，以中锋细笔勾形，气息匀静，赋之以青绿赭黄，清雅恬淡，无艳俗甜腻之气。周复俊(1496-1574)，字子籲，号木泾，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与文徵明乃忘年交。画心共钤印五枚，分别为右下方“大光”白文方印(孙大光用印)、“徵明”白文长印(文徵明用印)，左下方“徵明”白文方印(文徵明用印)、“四味书屋”朱文方印(孙大光用印)、“徵仲”朱文方印(文徵明用印)。

卷后有诸名家题跋。文徵明行书自题：

木泾见说幽居好，乔木苍苍五一湾。雅称名园依绿水，别开高阁占青山。百年胜概人增重，十里风烟兴寄闲。去去仙郎方许国，莫缘鱼鸟便思还。子籲起曹别业在木泾之上，雅有林泉之胜，因自号木泾居士。比岁奉使滇南，便道过家，非久还朝，不无淹恋之意。余因为作此图，且赋小诗为行李之赠。京华尘土中，时一展咏，或亦可以寄江湖之怀也。丁酉八月六日徵明识。

下钤“文徵明印”白文方印、“悟言室印”白文方印(文徵明用印)。引首钤“正大光明”朱文长印(孙大光用印)。

该跋交代了图卷创作时间和因由。彼时周复俊奉使滇南，便道过家，与文徵明叙旧，对其木泾幽居喜爱甚切，临别之际，文徵明为之作此图，以解周复俊宦游思乡之苦，亦可寄其心于江湖，时在明嘉靖丁酉(1537)。

杨慎行书题跋：

吴门滇徼两心期，河草江梅一岁时。朗月肯教玄度共，碧云知为惠休移。好音起夜忘衰病，喜气先春回暖姿。华顶温泉俱旧约，似留仙赏待新诗。庚子之冬，木泾周公奉使再至滇云。闻之，先以此诗奉迓。丁巳之岁长至，又会公于江阳，乃书此卷。偶因避暑构云房，敢拟寻仙觌紫芳。忽报轩车枉蓬荜，似从丘壑梦岩廊。蹉跎良会欣重遇，迅迈流年怪底忙。会圃登台新八咏，才情堪继沈东阳。丁巳仲冬望后一日，木泾公偕诸公招饮紫房观，余之玄阁行窝在焉。次韵一首以谢，并附录其后。升庵杨慎。

下钤“用修”朱文方印、“四味书屋”朱文方印(孙大光用印)、接纸处钤“叔履氏”白文方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状元。该跋主要记录了杨慎为周复俊作的两首七律，体现了二人深厚的交谊之情。嘉靖庚子(1540)冬，周复俊再次奉使云南，杨慎闻之欣喜为之作诗。丁巳(1557)夏至，二人会于四川江阳，杨慎获观此卷，并题前诗于卷中。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周复俊携诸友至杨慎紫房观雅聚，杨慎兴甚，再次于卷中题诗一首。

邢侗行书题跋：

戊子秋日举让王五云先生。用徵仲期大家，用用修期廷元。邢侗。

下钤“邢侗印”白文方印。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山东临邑人，明代书法家、画家，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大家”。由其题跋可知，万历戊子(1588)秋，邢侗将此卷惠赠予山东曹县王士龙，并期望更多诸如文徵明、杨慎这样的大家对此卷珍重宝之，爱惜之情足以见之。

钱达道行书题跋：

木泾图图子籲周先生郊居景也。蹙然一卷，得文、杨二太史手笔，足称不朽。余友百谷五子，袭而藏之久矣。日者持以赠邢侍御，而侍御复惠遗五云王子，寥寥片语，属望良殷，乃五云不忘一盼之雅。选地城南隅，树桃千余，筑舍其中，为藏脩游息之所。余闻而赏之。为赋一律，署之纸尾。安知楚丘之桃舍不与吴门之木泾并传也。筑室在城市，桃花夹舍浮。种从天上觅，根自武陵留。西圃知为母，前身或是刘。不妨金马客，暂此寄林丘。万历庚寅春仲海虞钱達道书于楚丘之询瘦轩中。

钤“古曹伯印”白文方印(王士龙用印)、“家藏金书玉册”朱文方印(王士龙用印)、“正大光明之室鉴藏书画之玺”白文方印(孙大光用印)，引首钤“抹黛山房”白文长印(钱达道用印)。

钱达道，活跃于明万历年间，字五卿，号培垣，江苏常熟人，万历元年(1573)癸酉科举人，曾任曹县知县、霸州知州、兖州府同知。该跋题于万历庚寅(1590)仲春。颇为难得的是该跋详细交代了《木泾幽居图卷》早期递藏情况。文中所提“百谷五子”，即王穉登，乃文徵明弟子。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百谷，号半偈长者松坛道士等，江苏苏州人，时与邢侗、董其昌、李维桢、冯时可并称“中兴五子”。王穉登或从周复俊处获藏此卷，王穉登将此卷赠予好友邢侗，邢侗又赠予王五云。王五云即山东曹县三槐堂王茂家族王士龙，字五云，号霖苍，贡士，崇祯元年(1628)任商州知府，王氏一门在明中叶曾以“父子五进士”显赫一时，王士龙亦为当时名流，与钱达道交游甚密。

罗文瑞行书题跋：

文待诏书画精研特甚，士气可爱，片纸只字赏鉴家珍重宝之。杨用修太史我朝名状元，词翰书法照映千古。皆一代明公。难乎续貂。古云佛头上着粪，非虚耶！不免娱母之诮，若遇子都当掩目矣。新安范阳山樵罗文瑞识，乙未清明后一日。

钤“罗文瑞印”白文方印、“伯符”朱文方印。

罗文瑞(1541-?)，字伯符，一字范阳，号阿痴、大鄣山人，歙县呈坎人，壮年奉母移居山东济宁，能书善画。万历乙未(1595)清明后一日，罗文瑞盖于山东王士龙家获观此卷，并欣然提笔留下墨宝。行文时罗文瑞透漏出谦卑之意，于文徵明、杨慎面前，认为自己之才华“难乎续貂”，所留只言片语皆为“佛头上着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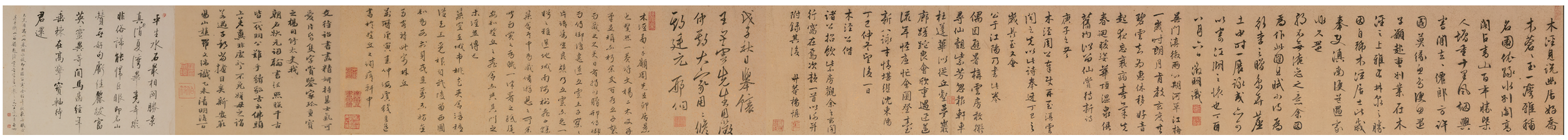
启功行书题跋：

平生水石最相关，胜景真疑消夏湾。毕竟奇踪非俗谛，能归臣眼即名山。赞无好句亏佳丽，跋富英灵异等闲。马齿经年垂棘在，高擎宝轴待君还。

大光同志以此卷相示，旋即出游，留寒舍经年。秋夜无眠，次卷中衡山翁韵题，后赏者当看以教之。一九八五年九月，启功。

钤“启功”白文方印、“元白”朱文方印，引首钤“启”朱文圆印。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元伯，北京人，当代著名书画家、鉴定家、教育家。此卷经晚明王士龙家族收藏后，有清一代藏家付之阙如，直至当代被著名收藏家孙大光收藏。孙大光(1917-2005)，原名世蔚，号四味，安徽寿县人。孙大光与启功为好友，得藏此卷后，遂邀请启功鉴赏，旋即又出游，此卷便一直放在启功家中数年，足见二人友情之纯挚。1985年初秋，启功夜展此卷，思绪万千，次文徵明诗韵题诗一首，增香宝轴。又二年，孙大光与夫人张刚将家藏书画重宝悉数捐赠于安徽博物院，《木泾幽居图卷》便在其中。至此该卷历经近500年流传，终于有了很好的归宿。也正是由于孙大光、张刚夫妇的无私捐赠，我们才得以在博物馆的展览中，近距离欣赏到先哲们的艺术瑰宝，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镜里千秋

吐鲁番出土的铜镜

帕丽旦木·沙丁

铜镜是古代用来照容的铜制生活用具，在我国最早发现于公元前2000年的齐家文化。铜镜春秋战国开始流行，汉代为鼎盛时期，隋唐为繁荣时期。从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成就来看，当属战国、两汉、唐代这三个时期的铜镜最优。在丝绸之路上，铜镜也一度是直追丝绸的“硬通货”。甚至，铜镜在中国古代文化里，还有“辟邪驱灾”的意义。

近年来，在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苏贝希墓地、加依墓地、艾丁湖墓地、交河故城沟北墓地、沟西墓地、胜金店墓地、木纳尔墓地、巴达木墓地、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铜镜。这些铜镜虽然数量不多，但充分体现了古代人群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包含区域文化的典型性和特征性，对于研究古代人群社会的发展、古代铜镜铸造技术、工艺美术、民俗民风、文字书法、文化交流和传播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

吐鲁番博物馆藏的吐鲁番出土铜镜主要有圆形带柄镜和圆形无柄镜，下面介绍几件在吐鲁番发现的铜镜。

先秦时期的铜镜

先秦时期的吐鲁番铜镜主要出土于鄯善洋海墓地，鄯善县苏贝希墓地也有出土，呈圆形，主要有无柄具钮镜、有柄无钮镜和无柄无钮镜等几种类型，这些铜镜可能是当地制作的，器型简单实用。

圆形具钮镜(图1) 1987年吐鲁番鄯善洋海墓地出土，边缘稍残。铸制，呈圆饼状，面微凸，素背，背无纹饰。直径7厘米、厚0.1～0.2厘米。拱桥形钮，方便穿绳携带，这件铜镜与哈密焉不拉克墓地、阿克苏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的铜镜相似，制作精美，因长期埋在土中已锈蚀。

带柄铜镜(图2) 1999年鄯善洋海墓地出土。片状，圆形带柄，柄上有圆形孔。直径11.5厘米、厚0.3厘米、通长15.5厘米。这件铜镜铸造精美，因长期掩埋于土中已生锈，形状与和静县察吾呼沟西墓葬出土的铜镜相似。

几何纹铜镜(图3) 2014年吐鲁番加依墓地出土。呈圆形，背面呈几何纹，略似五角星，桥型钮，有廓。直径6.8厘米。

圆形铜镜 1992年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出土。圆形，微残，残缺处存两个铜眼。厚0.1、直径9.3厘米。

素面铜镜(图4) 1989年吐鲁番艾丁湖墓地出土。铜质，圆形，素面，没有任何纹饰图案，直径5.4厘米。年代为战国至汉代。这件铜镜形状特点与1992年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出土的铜镜相似，边缘有两个铜眼。

汉晋时期的铜镜

汉晋时期的吐鲁番出土铜镜，既有中原输入的星云纹铜镜，又有当地制作的曲柄铜镜、圆形带柄铜镜，这些铜镜反映了当地居民使用铜镜的方法和习俗。

圆形带柄铜镜(图5) 2003年鄯善洋海墓地出土。薄铜片压制而成，呈葫芦形，上有穿孔。直径2.2厘米。年代为汉代。

曲柄铜镜(图6) 1994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出土。镜呈圆形，S形曲柄，柄背面有一半月形凹状饰，中有圆形细孔。直径6.2厘米、柄长5.2厘米。年代为汉代。

圆形铜镜(图7) 1994年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出土。镜面圆形，柄残缺。直径7.3～8.1厘米、厚0.1厘米。年代为汉代。

星云纹铜镜(图8) 1996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出土。星云纹铜镜残存1/4，铜质，铸造。圆钮，钮座由8枚乳钉与曲线相连。座外一周为弦纹和4瓣相对的弧弦纹圈带及短斜线纹。在短斜线纹及两周弦纹之间，有4枚圆座乳钉相间的4组星云纹，每组有6枚小乳钉与卷曲的云纹相连。内向16连弧纹镜缘。复原直径11厘米。

镶嵌木柄具钮镜残块(图9) 2007年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出土。三角形青铜镜残片，其背有钮，穿以皮绳，镶嵌在一个带柄木框中，镜面用6个小木钉固定。木框为圆木削制而成，由镜框和柄组成，镜框为圆形。柄上粗下细，端部削刻出一个桃形。长10.5厘米、镜框径4.4厘米、厚0.4厘米。年代为西汉。

铜镜残块 1980年吐鲁番艾丁湖墓地出土。仅存圆形镜边缘的小块，青铜质，直径7厘米，边厚0.8厘米，断面分作三层，中间一层厚0.4厘米。镜背有弧形的两段属于镜边缘上的宽楞，最宽的0.4厘米，楞上似有纹饰，锈残难辨。推测为西汉武帝时期铜镜。这件素面铜镜的式样、大小，与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中所发现的非常相似。

隋唐时期的铜镜

隋唐时期的吐鲁番铜镜大多来自中原地区，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出土汉字铭文铜镜和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葡萄纹铜镜，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原特色。其中，葡萄纹铜镜上丰硕的葡萄和藤枝纹来自西域，显示出中原与西域相互密切交流的痕迹。

瑞兽铭带纹镜(图10) 2005年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出土。铸制，圆形，圆钮，双凸弦纹将镜面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钮周围有四兽追逐图，外区有“常德秦王镜判不惜千金非预照胆持是自明心”铭文。直径9.5厘米、厚0.74厘米。镜面图案布局合理，纹饰精美，风格与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瑞兽铭文镜相似。

隋唐时期的铜镜不仅保存了中国铜镜为圆形的基本因素，继续着装饰吉祥语等铭文带特征，同时，还融入了更多的西来文化元素。此件秦王镜就是最好的例证，即带有西汉留下来的典故，又糅合了西来元素中的瑞兽。

葡萄纹铜镜(图11) 2004年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圆形，圆乳状钮，直径9.4厘米，沿厚0.7厘米，双凸弦纹将镜背面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钮座旁饰连弧纹，连弧文与内区凸弦纹间饰丰硕的葡萄和藤枝纹，外区饰相互缠绕的藤枝纹。时代为麴氏高昌时期(499-640)。

综上所述，吐鲁番位于丝绸之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段，这里发现的铜镜既有地方风格，又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有的铜镜是随着丝路贸易从其他地区传入的，有的则是在当地铸造的。先秦时期的吐鲁番铜镜既有中原特色的圆形具钮镜，又有当地制作的有柄圆形无钮镜，器型简单实用。

到了汉代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理，中原铜镜大量输入吐鲁番在内的西域地区，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出土汉代星云纹铜镜、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出土瑞兽铭带纹镜和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葡萄纹铜镜，都具有浓郁的中原风格。这些铜镜上的图案内容丰富，尤其是葡萄纹铜镜、瑞兽铭纹铜镜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吐鲁番胜金店墓地出土木柄铜镜，也为我们了解铜镜的使用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据。

石家有儿玉含晶

衢州史绳祖墓出土南宋咸淳十年紫石砚

赵文慧

子石砚

宋·崔德符

石家有儿玉含晶，嘘为云气吸为晴。
纯精与之相感并，孕育万状留千名。
黄昏鬼泣不忍听，且为白鹅了黄庭。

宋代文人对砚非常在意，就像在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做着选择，对砚质地的讲究，好像在砚石中发现纹脉就能文采焕然，宛如唐诗所说“霞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宋代砚台多为石质、陶泥，少数为玉、瓷、木……采用这些材料制作砚台，看似随意，事实上却反映了文人朴素的审美情怀。

衢州市博物馆藏有一方南宋端砚，又称紫石砚，是端砚中的佳品，为二级文物，也是砚台中的无价之宝。这方端石长15厘米，宽10.2厘米，厚2.5厘米，椭圆形，素身无纹，石呈紫色，石质均匀细腻，纹理清晰，软硬适度，集观赏实用和收藏于一体，因其石质地坚细适度，磨墨不费时，磨出的墨汁细腻均匀且用时不伤笔、不干墨，砚台正面有使用过的痕迹。这方砚台于1974年11月26日出土，当时，衢县王家公社瓜园大队农民吴天才在自家菜园挖土种植，碰到一座双穴砖室墓。事后将其中的金银器送到银行检验的时候，被发现可能为出土文物，后将全部出土文物34件上交国家。

经过鉴定，其中有7件为一级文物，16件为二级文物，其余全部为三级文物。该墓为史绳祖与继配杨氏合葬墓。墓中出土的莲苞形青玉瓶内的朱色粉末及墨、印、砚、笔架、镇纸等文房用具，反映了墓主人“闭户读易”“著书立言”的儒家学者的生活。史绳祖的墓志称，“神宗咸淳十年岁在甲戌十月丙午，学斋先生以寝疾卒于衢州和第之正寝……绍熙□□先生□□至是八十有三……”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从咸淳十年(1274)上推83年，应是光宗绍熙二年(1191)。史绳祖晚年寓居衢州，死后葬于今柯城区王家乡。作为南宋一位普通中级官员，其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之物却件件堪称精品。

史绳祖，字庆长，学者称学斋先生，眉山(今属四川)人，受业于魏了翁之门。曾作为诸生之一，就学于蒲江鹤山书院。“余时在鹤山书院……是时方从鹤山授《易》”(《学斋占毕》卷四《禹直鼎卦》)，记述了当时鹤山书院讲学的情况。史绳祖在魏了翁的熏陶下，通过读书，有疑者有所思，有思则有所得。后来他撰《学斋占毕》，便是自己读书有疑，思而有得的记录。

史绳祖历任梓州路转运使，朝议大夫、直焕章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等职。在梓州路任职期间，重修其师魏了翁曾修缮过的玉台极堂，立鹤山之碑。于淳祐十年(1250)为自己所著《学斋占毕》作序。《序》称“眉山史绳祖庆长书于梓漕极堂”，说明此书著于梓州转运司办公处附近的玉台极堂。

从朝廷奉祠归里，过叙州时讲学。又到泸州为诸生讲先天卦图，并为任文虎作《读易堂记》。后奉诏入朝，舟抵公安县时，力请祠，遂寓于公安。当时由于战乱，蜀士幸免者纷纷逃离四川，聚于荆鄂之间。鉴于“四民皆穷而士为甚”，孟珙曾筑室设教于公安、武昌等地以养士。史绳祖寓居公安期间，也从事讲学。其时“蜀士之寓于竹林、南士之仕于渚宫者，踵门求为讲切”(《学斋占毕》卷四《乾元用九天下治》)。不论是寓居避难的蜀士，还是在荆楚做官的南方之士，都登门求教，史绳祖为他们讲易学。

史绳祖指出：“道家者流，乃谓修证长生。若使人皆长生而不死，物皆长存而不亡，则一气之消息盈虚灭矣，世无此理也。是释氏又谓证无生，《忍法经》云：‘不生不灭’。则是使天下皆绝生意，从物物块然如死灰槁木，岂有是事哉！”(《学斋占毕》卷一《儒释老之异》)认为道教所谓长生不死，佛教所谓不生不灭均违反事物生长变第的客观规律，与世无补，与民无益。强调学者应求正学，不要流入异端。由此看来，墓中出土玉制、石质文房用具，是符合墓主人身份的，印证了其文士学者的生涯。南宋史绳祖墓文房用具的出土，说明此时已开始形成一种较为系列化的独特文房器类，并逐渐占据了文房书案的一端。

这方紫石砚坚实细腻，滋润发墨，因而有“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践通用之”(李肇《唐国史补》)之说。史绳祖在他的《学斋占毕》中提到“磨墨之砚，不损墨色，不害胶性，并且不掩墨香，方为上品。”可知史绳祖作为一位学者对砚石如此钟情而且对砚台的质地、成色、发墨研究颇深。什么材料制作砚台，都比不上用石头作砚台。因为石质才是砚材的“真材本性”。宋代的文人砚以其造型和实用成为砚台发展史上的经典，从实用性来说，石制的砚台正好符合“器以用为功”的标准：粗砺的石头发墨虽然很好，但却没有人用它做砚台，这是因为它的形状色泽太粗糙，缺乏美感；太注重砚石的实用性，不免会流于俗滥；而偏重砚石的纹饰雕刻，只能供在屋中做摆设，便失去了砚的作用。因而，砚石不是玉而似玉，是石头而非一般的石头。

汉代刘熙《释名》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使用研墨器研制颜料，绘制图案。在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过调色器。这些研磨器和调色器，算是砚的雏形。伴随着历史长河滚滚向前，砚台浓缩了各朝代文化、经济、审美意识的各种信息。而且，历史上战火频繁，相对于青铜器、玉器、字画等文物，古砚因其本身特征，较少毁于战火，亦不被帝国豪强所重视，保存相对较好。

这方南宋纪年墓出土的砚台，简洁朴素，寄托了墓主人的理想，从砚的背后，可以管窥墓主人的人生。对于宋代的文人来说，砚台不仅仅是书桌画案上一件普普通通的文房用具，从某种意义上说，砚台已经成为文人们抒发情感、表达志趣的艺术品。

真希望端一方古砚于手中，扣而聆之，隐约能听到古人研墨之声，咏砚之语。